

## 清初宜興派的八股文批評： 以豐義儲氏為討論中心\*

陳水雲

武漢大學文學院

### 前言

清初文壇有兩個既推重古文又不廢時文的文章流派，一個是桐城派，一個是宜興派。<sup>1</sup>對於江北的桐城派，人們瞭解較多，研究成果亦非常豐富；對於江南的宜興派，不但研究成果少，瞭解也非常有限。其實，以豐義儲氏為代表的宜興派，在清初文壇是甚有影響的，當時即有「海內言文章者必推宜興儲氏」之說。由儲欣編纂的《唐宋八大家類選》幾乎人手一編，風靡一時。儲氏家族先後湧現出眾多古文與時文兼善的文章高手，儲欣與弟儲宿、儲奇被人目為「三蘇」。<sup>2</sup>儲在文、儲大文、儲雄文兄弟，一個以時文見長，一個以古文取勝，一個擅長於詩歌（儲雄文有《浮青水榭詩》四卷）。宜興儲氏還以科甲門第顯赫一時，據儲大文〈豐義一世祖茂才成軒公傳〉的記載，這個家族有舉人十二人，進士十三人，中江南試第一又魁禮部試者一人，中禮部試第一者一人，魁府丞承宣使試者五人，入翰林四人，侍直南書房一人，監察御史一人，郎中三人，員外郎一人等，<sup>3</sup>實在是不負「兩元門望」、「三鳳家聲」、「五子登科」、「奕葉甲科」的美譽。這是一個科舉、經濟、文章兼擅的文化望族，族人在文章著述上表現尤為突出，既編選了《古文選七種》、《唐宋八大家類選》、《儲氏詩詞彙

---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專案「八股文批評史」（10BZW067）的研究成果。

<sup>1</sup> 何雨厓〈題王耘渠稿〉云：「自韓長洲後，江左文派有三，得皖桐而高，得義興而厚，得金沙而細。」見梁章鉅：《制義叢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頁188。

<sup>2</sup> 吳蔚起〈在陸儲先生墓志銘〉云：「同母弟二人，曰宿，曰奇，裁弱齡耳，先生撫之若慈母，誨之若嚴師。閱數年，相繼籍于校，文望與先生埒，邑人往往有『三蘇』之目焉。」意指儲欣年最長，二弟受其教育，有類北宋的蘇洵、蘇軾、蘇轍。見《宜興豐義儲氏分支譜》（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卷八，頁382。

<sup>3</sup> 儲大文：〈豐義一世祖茂才成軒公傳〉，載《宜興豐義儲氏分支譜》，卷一，頁212。

選》，<sup>4</sup>也彙刻了《在陸草堂文集》、《儲遁庵文集》、《雲溪文集》、《存研樓文集》、《經畚堂文集》等書。有的文章輯入《國朝文匯》，有的著述收入《四庫全書》。<sup>5</sup>因此，對這一家族成員的文章著述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特別是這樣一個以科舉起家的文化家族，在科舉、時文和古文上的突出表現，在時文和古文上的理念，以及它在當時文壇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對於瞭解明末清初文化而言都有重要的意義。

### 儲氏的舉業與文章

宜興儲氏系出唐朝開元進士、監察御史、著名山水田園詩人儲光羲，儲光羲本籍兗州（今山東兗州），肅宗乾元年間遷至潤州（今江蘇鎮江）的莊城，這是儲氏在江南地區繁衍的開始。宋朝南渡時期，儲氏後裔又由莊城遷徙到常州的宜興，卜居在臧林，「臧林者，吾族萬壑之源也」，<sup>6</sup>其他如金沙、豐義、儒村、柚山、壩上、東西路墅以及江北的泰州皆自臧林一系而來。至於豐義儲氏，始自儲光羲第二十世孫儲洪，他在明初洪武二年（1369）入贅蔣氏，因而家於豐義之儒林里。「公以一身寓居其里，三世而繁衍，五世而昌大，八世而顯達」。<sup>7</sup>所謂「三世而繁衍」，是指儲洪生子四人，析首分、二分、三分、四分；所謂「五世昌大」，是指第四代儲文用亦有子四人，再析為東四分（邦彥）、西四分（邦美）、老三房（邦本）、老十房（邦寧）；所謂「八世而顯達」，是指八世孫昌祚、顯祚兄弟先後為進士。昌祚（1559–1630）為萬曆十七年（1589）三甲進士，歷任鄱陽、浦城知縣、浙江道監察御史；顯祚（1575–1651）為萬曆四十四年（1616）三甲進士，歷任戶部主事、襄陽知府、湖南按察史。也就是說，經過八代繁衍，豐義儲氏已成為顯赫一方的文化望族，其中，昌祚、顯祚兄弟的先後進士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蓋自明季副憲〔昌祚〕、廉使〔顯祚〕二公進士起家論謀，垂裕文孫。在陸先生〔儲欣〕用文章顯名，講授數十年，為後進所宗」。在儲欣之後，這一家族的子孫，在科舉仕進上可稱得上是代有傳人：「若遁庵〔方慶〕、素田〔右文〕、畫山〔大文〕、中子〔在文〕、允弢〔郁文〕、水榭〔雄文〕、東溪〔龍光〕、雲溪〔掌文〕、梅夫〔麟趾〕、緘石〔秘書〕諸先生，英英蔚起，奕葉簪纓，科第踵接，有會三鳳、鄉三鳳之目，較前代荀之龍、薛之鳳、王之珠、竇之桂，有過之無不及，即視琅琊諸王之人人有集，又何忝焉？」<sup>8</sup>

<sup>4</sup> 《唐宋八大家類選》為儲欣編選，《古文選七種》是儲欣去世後由門人徐永勳、吳振乾、董南紀及其子儲芝、孫儲掌文、從孫儲在文在舊稿基礎上編選而成的，《儲氏詩詞彙選》為儲嘉斌輯錄。

<sup>5</sup> 儲大文《存研樓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國朝文匯》選有儲欣、儲在文、儲掌文的文章。

<sup>6</sup> 儲欣：〈族譜敘〉，載《宜興豐義儲氏分支譜》，卷首，頁21。

<sup>7</sup> 同上注，頁22。

<sup>8</sup> 周家楣：〈宜興豐義儲氏宗譜序〉，載《宜興豐義儲氏分支譜》，卷首，頁37–38。

作為一方文化望族，豐義儲氏在文章上的成就尤為突出。「宜興儲氏以文章名天下，歷宋、元、明，代有聞人，至本朝而分支豐義者稱絕盛」，「其積厚流光，以大啟厥後者，實自先生〔在陸〕祖副憲公〔儲昌祚〕始」。<sup>9</sup>據載，儲昌祚少嗜《左傳》，中年喜為老莊，晚年愛邵雍《擊壤集》，又喜觀內典，家藏佛書甚富，能以學傳家；儲顯祚少習經義之文，歲歲束貯，贏數巨箱，雖為簡煉揣摩，卻是篝燈達旦，至晝而不廢，人稱之為「宋刻經籍體」。儲國祚（忞鞠公）（1558–1619）也是帶動儲氏家族追求人文風尚的重要人物，儲欣說：「吾儲氏徙居臧林，稱義興文章望族，代有名人。及再徙豐義，以能文發聞鄉國、聲譽徧天下者，實自我伯祖忞鞠公始。……吾家百年來學問、文章、異敏之士，悉公開先。」<sup>10</sup>國祚雖天資魯鈍，然一心向學，刻苦自礪，終成大器。萬曆四十三年（1615），在六府三州士子參加的院試中獲第一，次年廷試復得第一，連中兩元，為貢元，甚得當朝相國葉向高的器重，這也為後代儲氏子弟樹立了勵志向學的榜樣。儲氏文章在康熙時期達到極盛，有所謂「儲氏文章，衣被海寓」之說，<sup>11</sup>海宇之內亦奉儲欣為導師，「四方之士不遠千里而師事之」。<sup>12</sup>

儲欣（1631–1706），字同人，學者稱「在陸先生」。少而好學，酷嗜經籍，有乃父之風。「先君於聲色華靡，諸貴游所好尚，一不入，獨湛深嗜書，雞三號而起，盥櫛畢，即抑首縱觀，夜二更乃罷，以為常」。<sup>13</sup>然而，不幸的是，他的父母在順治初先後去世，「事伯父、四叔父頗久，垂五十年」，<sup>14</sup>故他受伯父儲懋端和四叔父儲懋揚影響甚深。儲懋端（1588–1677），字孔規，號象岩，為昌祚長子，附例太學生，鄉飲大賓。「性好書，尤喜三唐詩，自製詞曲工麗，音律分判得絕傳」，<sup>15</sup>儲懋時曾為之撰八十壽詩曰：「傳經九十尋常事，笑拾新詩入錦囊。」<sup>16</sup>儲懋揚（1593–1672），字文立，昌祚四子，邑庠生，鄉飲大賓。「叔父嗜靜，竟歲不入市，坐斗室覽經籍，闕無人聲」，「雅不喜瑣麗事，牆漫漶弗巧，衣敝垢弗易，食粗糲弗厭，而讌集必豐肅，師傅必忠且敬。嘗命欣居塾誨二弟，其飲食欣者踰叔父十倍，欣固謝而叔父終弗變也」。<sup>17</sup>受到家族門風的激勵，又獲得伯父叔父的指導，儲欣刻苦自勵，「晝出晚歸，一燈熒熒，洛誦達旦」。<sup>18</sup>自謂與弟相依為命，「晝則百計支撐，夜則挑燈雜誦，天寒

<sup>9</sup> 吳焯：〈豐義譜序〉，載《宜興豐義儲氏分支譜》，卷首，頁33。

<sup>10</sup> 儲欣：〈從伯祖忞鞠公傳〉，載《在陸草堂文集》卷四，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集部第259冊，頁452。

<sup>11</sup> 吳焯：〈豐義譜序〉，頁33。

<sup>12</sup> 吳蔚起：〈在陸儲先生墓志銘〉，頁382。

<sup>13</sup> 儲欣：〈先君子傳略〉，載《在陸草堂文集》，卷二，頁450。

<sup>14</sup> 儲欣：〈伯父傳〉，載《在陸草堂文集》，卷二，頁453。

<sup>15</sup> 同上注。

<sup>16</sup> 儲大文：〈象巖公傳跋〉，載《宜興豐義儲氏分支譜》，卷七，頁109。

<sup>17</sup> 儲欣：〈四叔父傳〉，載《宜興豐義儲氏分支譜》，卷十，頁85–86。

<sup>18</sup> 吳蔚起：〈在陸儲先生墓志銘〉，頁381。

宵永，往往擁衾背坐，互背所讀書，未及半而鄰雞盡鳴，和衣寢矣」。<sup>19</sup>他涉獵廣泛，自五經子史及先秦兩漢唐宋大家之書，「靡弗含咀浸灌，而大發之于文」，<sup>20</sup>先後著有《在陸草堂文集》、《曲臺疑》、《詩偶存》、《春秋指掌》，及點評之《易》、《詩》、《書》、《周禮》、《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等。<sup>21</sup>但是，他的科舉之路卻充滿坎坷，自謂：「某十歲屬文，頗為父兄所器，謂此子可早拉青紫。今犬馬之齒，四十餘歲矣，童頂顰面，困頓諸生中。」<sup>22</sup>他曾十下棘闈，直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十歲時，才得中舉人，次年應禮部試，未第，遂棄絕舉業，以讀書、著文、課徒為樂。值得一提的是，儲欣將自己的幾位從孫培養成舉人和進士的顯赫業績，他們是：儲右文(1659–1726)，字雲章，號素田，康熙丁巳(1677)順天舉人；儲大文(1665–1743)，字六雅，自號「樊桐逸士」，學者稱「畫山先生」，由廩監生中式康熙甲午(1714)順天舉人、辛丑(1721)會元、殿試二甲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儲在文(1668–1729)，字禮執，號待園，學者稱「中子先生」，中式康熙戊子(1708)順天鄉試第二名舉人、己丑(1709)第十三名進士、殿試二甲三名，授職翰林院編修；儲郁文(1690–1749)，字允弢，又字從吾，號補齋，中式康熙甲午(1714)舉人、辛丑(1721)會魁；儲雄文(1690–1749)，字汜雲，號水榭，康熙辛卯(1711)順天鄉試舉人、辛丑(1721)進士；儲高文(1664–1733)，字鳳禎，由邑廩生中式康熙戊子(1708)第二名舉人。儲氏兄弟五人，並登甲乙榜，人稱「五鳳齊飛」，藝林傳為盛事。「自御史公〔儲光義〕以唐賢負詩名，繼繼繩繩，至有明參藩〔昌祚〕、僉事〔顯祚〕諸公，昆季競爽，以文儒為循吏，遂宏其緒。至本朝同人〔儲欣〕先生，而文大昌宇內，稍知識字讀書者，無不虔而奉之。清源〔善慶〕、井陘〔方慶〕兩公，以古文名家；五鳳繼起，畫山、中子兩先生，尤為世所推重」。<sup>23</sup>儲氏在科舉和文章上的顯赫成就，也促成了宜興地區濃厚的人文風尚，在當地，人們是以儲氏作為教授子弟榜樣的：「儲氏昆季皆恂恂儒雅，言行不苟，而其文章大都踔厲風發，不可一世，以為儲氏之才，莫盛於是矣！……儲氏之教子弟也，嚴而有法，其為學也專而勤，故吾鄉之言勤苦讀書者必推儲氏君子，而吾鄉之有志於勤苦讀書者必延儲氏子弟為師。」<sup>24</sup>

以儲氏家族為中心，清初宜興地區還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文章流派——宜興派，儲欣有文章真切地描述自己在順治年間與當地文士一起切磋文章學問之道的情形。他說：

<sup>19</sup> 儲欣：〈七弟君宜傳〉，載《在陸草堂文集》，卷四，頁457。

<sup>20</sup> 吳蔚起：〈在陸儲先生墓志銘〉，頁382。

<sup>21</sup> 同上注，頁384。

<sup>22</sup> 儲欣：〈答楊明揚書〉，載《在陸草堂文集》，卷二，頁405。

<sup>23</sup> 周家楣：〈宜興豐義儲氏分支譜序〉，頁6–7。

<sup>24</sup> 錢維城：〈儲氏詩詞彙選序〉，載《常郡八邑藝文志》卷六，收入賈貴榮、杜澤遜(輯)：《地方經籍志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頁171。

曩予年未二十，偕舍弟君宜〔儲奇〕、從侄長能〔方慶〕、廣期〔善慶〕，慨然思麗澤之益，萃友八人，而兄〔周澹芹〕為之長，予視兄年長幾倍也，顧為忘年交，里中稱曰「八俊」。既而廣之為十二人，十二人者約曰：「非聖賢之書勿視，非其行勿由，不幸有過，必面責，改然後止。」則又約曰：「文之課，月有三：合而課者一，離而課者二，合而課為書之藝七，離而課書之藝五，後場詩賦諸體古文各一。」既約而退，循而行之，寒暑弗輟者凡七八年，方月之合而課也，昧爽咸集，達於五更，燈光爛明，延照戶外。時豪於文者，為周兄天綏，捋鬚叉手，揮翰風飛；狂者為長能，睥目高吟，聲出如虎；靜者為葉兄培生，從容就席，以至於畢，喜慍無迹；其他或敏或舒，或默或語，高明沉潛，未易殫狀，而其間攢眉搯掌，終日危苦，不肯苟下一字者，獨我澹兄及舍弟君宜而已。<sup>25</sup>

這裏「八俊」，是指周澹芹、周天綏、葉培生、吳仲文、儲欣、儲奇、儲善慶、儲方慶；所謂「十二人」，是指上述「八俊」，再加上許子廷、周亞卿、周亮生、徐叔遠四人。十二人中有八人為儲氏家族成員之外的文士，大約在順治七年到順治十四年間（1650–1657），他們有社規，有月集，時間長達七八年之久，這是一個以儲氏家族成員為核心，以切磋經義為主兼及詩賦的文人群體。然而，進入康熙時期以後，這一文人群體漸趨式微，正如儲欣所說：「吾黨十二人，君宜最少最先夭；周兄亮生繼之；長能甫得官，以非命死；徐兄叔遠貧死；亞卿周兄劫于盜，怛而死；廣期棄縣令歸，歸不數年，亦死；天綏兄初以稅事被斥，牢落不得志，死於前年秋；及今春澹兄又客死焉。」<sup>26</sup>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以儲欣為領袖，以儲氏子弟為核心，以儲氏家塾九峰樓為中心的新興文人群體。康熙二十二年（1683），儲方慶去世後，在儲欣的指導下，右文、大文、在文、郁文、雄文兄弟在九峰樓讀書十年，「出則就正草堂，入則愚兄弟互相問難」。<sup>27</sup>這時，因為科途受挫，儲欣棄絕舉業，築室「在陸草堂」，將全部精力轉移到教育子弟上。「自在陸先生以經史之學倡道東南，從遊之士制義翕然進於古，最著者畫山雅奧沈雄，中子閔深肅括，並推風會總持」。<sup>28</sup>儲氏子弟先後執經草堂者，有潘宗洛（巢雲）、吳芥亭、陳枋（次山）、潘旂（魯觀）、郁士超（峻升）、吳崇（冲扶）、吳曷（又葵）及華慶（少白）、奎門（孟為）、芝（梅隱）、可權（來肅）等。繼儲欣之後，大文也在「九峰樓」開館授徒，督課子侄暨陳甥義焯、瞿甥源洙，四方才彥亦接踵而至，先後有吳煒、蔡寅斗、萬松齡、史崧、曹澤咸、徐思靖

<sup>25</sup> 儲欣：〈周澹芹遺稿序〉，載《在陸草堂文集》，卷五，頁481–82。

<sup>26</sup> 同上注，頁482。

<sup>27</sup> 儲郁文：〈先仲兄畫山先生行狀略〉，載《宜興豐義儲氏分支譜》，卷七之四，頁366。

<sup>28</sup> 王步青：〈儲于賓遺稿序〉，載《已山先生文集》卷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73冊，頁736。

等，「門牆桃李頗類往者草堂絕盛時」。<sup>29</sup>晚歲，他自築畫山樓，門下士請業者，登樓談辨，終日不倦。「吾鄉宜興儲氏，當勝國之初，坐傾嵇、阮，座集機、雲，在陸而下，五文繼起，而以〔六雅〕為白眉」。<sup>30</sup>這說明清初宜興派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順治時期，以「八駿」「十二人」為代表，第二階段是以儲欣為領袖的康熙時期，第三階段則是以儲大文為領袖的雍正時期。

### 儲欣：「時文如魚肉，古文如穀種」

在清初文壇，宜興儲氏以時文享譽一時，與桐城方氏、長洲何氏、金壇王氏、淳安方氏、會稽徐氏並稱，「以工四書文為學者所宗仰」。<sup>31</sup>然則儲氏群從以儲欣文章為之首，其子儲芝說「先君子以時文名海內垂四十年」，<sup>32</sup>儲欣的時文能融古文之法入時文，他參加康熙二十六年（1690）鄉試，主考官安邑王公獲卷歎曰：「真古文！真古文！」<sup>33</sup>他的庚午（1690）鄉試闈墨，波瀾意度，純乎古文之法，且不蹈襲古人一字一句。<sup>34</sup>正如其侄大文所說：「先生自運則鑄唐宋以探秦漢之精，採天〔啟〕、崇〔禎〕以化正〔德〕、嘉〔靖〕之貌，才高而繩削彌謹，齒宿而詞意彌新，實克於荊川〔唐順之〕、震川〔歸有光〕、孟旋〔方應祥〕、子駿〔金聲〕、大士〔陳際泰〕後，斷然自為經義大家而楷樞後學，功尤鉅也。」<sup>35</sup>他的時文兼經義與古文之長，既能載孔孟程朱之「道」，又注意吸納秦漢唐宋古文之「法」：「自孟、荀、董、揚為斯文道法之宗，……至嘉靖而遵岩〔王慎中〕、浚谷〔趙時春〕、荊川、鹿門〔茅坤〕、震川氏，胥用古文詞鳴，唐、茅、歸三公，又號經義大家。後復寢百年，千子〔艾南英〕、大樽〔陳子龍〕二者，差具體而微，他如朝宗〔侯方域〕、勺庭〔魏禧〕工古文詞，而科舉文鈔所傳述，青峒〔方應祥〕、子駿、文止〔羅萬藻〕、大士、蘊生〔黃淳耀〕暨代興，諸喆彥經義多奧衍造極而鈔湛深，於古藝之至者不兩能。……若從祖在陸先生，所謂兩能其藝之至，而法胥與道合，以克豎海寓碩望者與！」<sup>36</sup>儲欣文章乃承續唐順之、茅坤、歸有光而來，既擁有侯方域、魏禧所缺少的時文之長，又克服了方應祥、金聲、羅萬藻、陳際泰等的「鈔湛深」，在弘揚孔孟之義理與古文之文法上臻於完美的結合，從而獲得海宇的「碩望」。

<sup>29</sup> 儲郁文：〈先仲兄畫山先生行狀略〉，頁368。

<sup>30</sup> 綠天翁：《綠天清話·畫山樓》，《小說月報》第3卷第7期（1912年10月15日），頁3。

<sup>31</sup> 章學誠：〈葉鶴途文集序〉，載《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卷二一，頁207。

<sup>32</sup> 儲芝：〈在陸草堂文集目錄跋〉，載《在陸草堂文集》，卷首，頁383。

<sup>33</sup> 儲大文：〈在陸先生傳〉，載《在陸草堂文集》，卷首，頁378。

<sup>34</sup> 曹鳴：〈在陸草堂文集序〉，載《在陸草堂文集》，卷首，頁372。

<sup>35</sup> 儲大文：〈在陸先生傳〉，頁377。

<sup>36</sup> 同上注，頁376。

相對於古文來說，時文並非儲欣之所專。但經過長期的揣摩，日積月累的訓練，還有過十年賓興（鄉試）的經歷，為文自然不會遜色多少。「先生古學淵邃，於書無所不讀，丹黃甲乙，日無停晷；時文非所屑為，屈首一為之，皆約六經之旨以成文」。<sup>37</sup>只是在科場上屢屢受挫，使得儲欣對時文不免有了厭棄之意，他有一段話真切地描述了自己習文的經歷及感受：

某少好古書，年二十，凡先秦兩漢司馬氏、班氏及唐宋八大家之書，雖不盡精曉，然亦多有成誦者，為文深入敢戰，雖不盡軌於正，然有時言人所不能言。一試不利，或曰：「子過矣，子南其轅也，而北行可乎哉！」聞若言，稍稍自疑；無何，又有告者，如或言；無何，抑又有告者，言從同，同若一口；則大惑，視舊所學，棄之恐不速矣！進告者而商所學，皆曰：墨卷、墨卷云爾；問何等墨卷？又皆曰：圓熟無疵累，讀之順口，而句調可通用者，得百篇足矣！多則不精。又皆曰房稿，文之未粹者也。大家名家，惑世誣民，誤人不淺也。經史古文，風馬牛不相及也！某恍然大悟，曰：唯習之，期年而試，試復不利。未幾，得闈中棄卷觀之，有司評曰：平熟。所直數語，皆所讀墨卷中句調，號為圓熟無疵累者也。因大悔恨，急取舊業理之，初格格不相入，後稍相習，及執筆為文，而曩時深入敢戰之氣，銷鑠已十之五矣。然見者猶大怪，親知相遇，必隱規微諷。其最善立言者，則曰：「文各有時，子文非不佳，惜非時耳！」某感其言，且前且却，意欲參雅俗以希倖一遇，而試又見黜矣！自是之後，茫無適從，志亂氣靡，百累交集，讀先輩則受累在先輩，讀時文即受累在時文，未得手而厭生，已改塗而復憶清平奇正。往往三年之文，若出數手，一年之作，亦分數體，此最可笑也。日月易邁，坐致蹉跎，總緣不知人生有定命，紛紜顛倒於定命，無絲毫增益，而學術謬戾，仰愧古人，至今思之，可笑亦可涕耳！<sup>38</sup>

儲欣這一段話講到自己學習時文經歷的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學古人之法；第二階段是習時文之法，包括習墨卷和房稿；第三階段是「志亂氣靡，百累交集」，無所適從。如果說在寫作時文之初還有學習揣摩的意思，那末到了後來就逐漸認識到科場上順與不順，與文章本身沒有必然的聯繫，因此，他最後走上放棄時文寫作的道路，「屢月不拈一題視為常事」。<sup>39</sup>他自稱：「某治時文最久，然非性所好，少壯時漁獵書籍，有志古作者之林。今白髮滿頭，蓄志未就，然緣此於時文之業，雖久而不

<sup>37</sup> 曹鳴：〈在陸草堂文集序〉，頁372。

<sup>38</sup> 儲欣：〈答楊明揚書〉，頁405-6。

<sup>39</sup> 同上注，頁406。

專。」<sup>40</sup>相對時文而言，他更偏好古文，時文非其所專也。曹鳴也說儲氏「不從時文中作生活」，「時文非所屑為」。<sup>41</sup>

儲欣還從自己的切身經歷，深刻地體認到時文之弊：市面上流行的大多只是一些「讀之順口」、「圓熟無疵累」、空洞無物的「房稿」和「墨卷」。當時，友人邵文孫來信指出他所編鄉會墨卷有「寬隨」、「傳會」、「圓融」之失時，他回信說：「甚善！甚善！有人於此疾痛在身，不能自言也。醫之良者布指察脉，發其寒熱癥結，與凡內外之患，抵掌而談，其人即未服藥，而心胸釋然，疾之去可十五六矣！」<sup>42</sup>他對邵文孫的批評表示認同，實際上也是對時文「寬隨」、「傳會」、「圓融」之失批評的認同。對於那些專為應試而編選的書籍，儲欣是很不以為然的。有朋友編選了一本《四書鏡》，請他作序，他回答說：「凡《四書》之有講章說數，取足為制舉業資而已。……徒殫精疲神，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講說，則其他無乃不暇及，與子以吾言思之，是書雖不葺可也。」<sup>43</sup>在他看來，為文當根以六經之旨，並得古人立言之法，然後才能自成一家。從這個角度看，古文與時文是互為補充的，他做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且夫時文之美，魚也，肉也，宿昔之食耳；古文如穀種，其生不窮，食之豈有量哉！今日未能去離時文，即所先置力者，必擇其與時文不甚懸隔，而以己之材質參焉；或取與己近者，不則與己反者；取與己近，所以充吾長也；與己反，所以攻吾短也。」<sup>44</sup>這表明了他以古文為本，時文為末，以古文濟時文的觀點。他不但編有《在陸制義》，而且還選有《隆萬天崇大小題文選》，只是他要求為文做到「道」與「法」合，認為應博採眾長，特別是應該從經、史、諸子百家、秦漢唐宋古文那裏吸取文章之法，因此，他還先後編有《古文選七種》、《唐宋八大家類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並點評各家文法，以供初習時文者揣摩。

儲欣自言幼時習文是從《唐宋八大家文鈔》起步的，通過多年的口誦心維，對八家文法多有會心之處，「遇所得意輒舞蹈不自制」，並發感慨道：「茅先生表章前哲，以開導後學，述者之功，豈在作者下哉！」<sup>45</sup>儲欣晚年課孫的時候，亦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編選有《唐宋八大家類選》一書，共六類十四卷。「在陸先生別八家之類而分之，復比八家之類而合之。其分之者不由類中以求其類，而悟行文之體之所以同；其合之者，並使人由類中以思其不類，而見古人之所以異；是則先生之志

<sup>40</sup> 儲欣：〈答邵文孫書〉，載《在陸草堂文集》，卷二，頁411。

<sup>41</sup> 曹鳴：〈在陸草堂文集序〉，頁372。

<sup>42</sup> 儲欣：〈答邵文孫書〉，頁411。

<sup>43</sup> 儲欣：〈四書鏡序〉，載《在陸草堂文集》，卷五，頁468。

<sup>44</sup> 儲欣：〈答汪尊士書〉，載《在陸草堂文集》，卷二，頁409。

<sup>45</sup>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總序〉，載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04冊，頁236。

乎！」<sup>46</sup>但是經過多年摸索，他對茅編《唐宋八大家文鈔》的認識又有了變化：「雖曰表章前哲，而掛漏各半，適足以揜遏前人之光；雖曰開導後學，要所以錮牖其耳目，而使之不廣者亦已多矣！欲無遺議，得乎？雖然，嘗即其選與其所評論，以窺其所用心，大抵為經義計耳！其標間架，喜排疊，若曰此可悟經義之章法也；其貶深晦，抑生造，若曰此可杜經義之語累也；其美跌宕，尚姿態，若曰此可助經義之聲色也。」<sup>47</sup>他認為世易時移，時代在變，文章亦在變，茅坤的時代為「攻時文取科第足了一生之世」，而自己所處的康熙時代為「攻時文取科第而非成學治古文亦無以自立之世」，「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其不可同類而並語之亦明矣」。<sup>48</sup>當今攻時文者，當先成學而後治古文，亦即上文所說的要做到「道」（成學）與「法」（治文）合。儲欣為從孫儲在文時文作序時說：「禮執之學，深探六經，採漢宋註，參鈔卷端，附以己見，熟復《史》、《漢》，吟繹韓、歐、蘇氏之書，他若諸子百家，無不覽也，無不掇也。窺其心，將博極而止，而所得往往發之於時文。」<sup>49</sup>因此，他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再輯為《唐宋十大家全集錄》五十二卷，力圖擴大初學者的視野。「自儲欣以古文詞有名，其家父子兄弟多以此相鏃礪。掌文為欣之孫，得其指授為多。今世所傳欣選《左》、《國》、《史》、《漢》及唐、宋十家文，即其甄錄以授掌文者也」。<sup>50</sup>

從他習時文的經歷和體驗，到他對時文與古文特性的辨析，再到他習時文當從古文入手的主張，並著手編選《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說明儲欣對於古文和時文的認識是體用和本末的關係，只有以古文為立足點，才能使時文進入道與法合的境界。

### 儲大文：「以仁義之質，標古雅之神」

儲欣之侄儲方慶（1633–1683），早年為「荊南八俊」之一，「少時留意經濟，頗能通曉古今之宜民物之故，為舉業所困，勉率父兄之教，以求功名」。<sup>51</sup>但他習為八股二十一年而未售，後因康熙五年（1666）改試策論而獲鄉試第一，次年成進士第三，「對策數千言，陳天下事，皆人所不敢言」。<sup>52</sup>從自己的科考經歷，以及前後命運的變化，他得出這樣的認識：天下文章都是用以經世的，策論與八股實無高下之分，文章高下與個人遇合並無必然關係。他還提出「傳世之文」與「應世之文」的說法，並談

<sup>46</sup> 吳振乾：〈唐宋八大家類選序〉，載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乾隆十年受祉堂刻本。

<sup>47</sup>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總序〉，頁237。

<sup>48</sup> 同上注。

<sup>49</sup> 儲欣：〈禮執時文序〉，載《在陸草堂文集》，卷五，頁484。

<sup>50</sup>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578。

<sup>51</sup> 儲方慶：〈與周參議書〉，載《儲遜菴文集》卷一，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輯第26冊，頁23。

<sup>52</sup> 宋榮：〈儲遜菴文集序〉，載《儲遜菴文集》，卷首，頁2。

到兩種文體的不同品格：「傳世之文，不與遇合期，故有抑鬱困頓以堅其志，而文章愈垂於不朽者，若應世之文志在遇合而已。志在遇合而不遇，則其文必不工，而又何以取信於天下？」<sup>53</sup>很顯然，儲方慶是反對專為「應世之文」的。以遇合為目的的文章，或有工者，或有不工者，但不遇者必然不工。從這個角度看，作文者不應求其遇合與否，論文者亦不以遇合為尺度，而以是否出於性情為旨歸：「文章本于性情，雖限之以對偶，範之以聲律，其本于性情者自若也；性既不殊，學復相等，傳世應世，其理同揆，安得分此之為不遇，而彼之為求合歟？故夫工于文者不以遇合，櫻心而自屈其邁往之氣；善論文者不以遇合，懾志而故違其獨見之明；此古今以來有志于文章者之定論也。」<sup>54</sup>

方慶有五子，人人都是寫作古文時文的高手，先後結集有《儲氏六子文》、《九峰樓課業》、《存園課業》，<sup>55</sup>在文更有《經畚堂自訂全稿》傳世。至於大文，「制科之文遍寰宇」，<sup>56</sup>「時藝佳者不下數千首，多借刻他氏，其自訂而欲續刊者亦如干首」。<sup>57</sup>他有文章談到自己習制義的經歷，描述他在八股文寫作上逐步體悟的心路歷程：

予少承庭塾誨，日誦經史秦漢唐宋文，間治科舉文字，年十三差有省，十五學殖差進，二十又差有省。……蓋於有明諸先正大家考索差遍，間摹大士、正希〔金聲〕，又摹文止，又摹孟旋、若士〔湯顯祖〕、復所〔楊起元〕，後摹熙甫〔歸有光〕、順甫〔茅坤〕。……歲壬午〔1702〕，館京口焦山寺，日昃時步削石湍潮間，倏悟曰：朱子不云爾乎？「百步外較射，唯顏子能中紅心，而夷惠不與焉」。夫守溪〔王鏊〕、荊川亦經義中射侯之槩也。……歲壬辰〔1712〕，復館淮陰，夏四月七日，夜漏下二十刻，再悟曰：經義參古文詞而神，業歧而二，有明作者，守溪其至矣！曩予於焦山得之矣，而神未全也。今而後，夫殆得全者幾矣！自此，識始畫一而齒行五十，重憚捉筆，殊不願朋諸少年試，知舊時來慰勗。……雖間被摧挫，亦輒作溫辭獎厲，不少鑄貶，以此知京口悟、淮陰再悟，而文輒再進，雅為射中紅心之準，其於謫瑣鈍耗，寔了無所用，而或擬諸識途之馬、警夜之鶴，儻亦堅志場屋，士之所宜無忽也。<sup>58</sup>

他學習寫作時文，是以古文為根基的，大約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廣泛地揣摩和學習明代時文大家；第二階段是「焦山之悟」，以王鏊、唐順之為揣摩學習

<sup>53</sup> 儲方慶：〈八股存稿序〉，載《儲遜菴文集》，卷二，頁47。

<sup>54</sup> 同上注，頁47-48。

<sup>55</sup> 儲大文：〈三弟中子傳〉，載《宜興豐義儲氏分支譜》，卷七之五，頁104。

<sup>56</sup> 黃玉衡：〈存硯樓二集序〉，載《存硯樓二集》卷首，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19冊，頁428。

<sup>57</sup> 儲郁文：〈先仲兄畫山先生行狀略〉，頁375。

<sup>58</sup> 儲大文：〈自訂臨場藝序〉，載《存硯樓二集》，卷九，頁562-63。

的重心；第三階段是「淮陰之悟」，以古文入時文，通過古文體悟時文之法，終而悟得時文之「神」。正因為有這樣的創作體悟，才會不被一時的遇合所困折，直到五十七歲那一年才高中榜首，為會元，會試主考官遂甯張鵬翮贊其卷曰：「真法度！真才情！」他晚年在畫山樓課徒，左指右畫，頗得精要，「手錄《定》、《待》、《閑》、《在》、《韻》、《室》暨歷朝名稿闡讀共五千首，目曰《明文透宗》」。<sup>59</sup>儲大文在八股文批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是宜興派作為清初重要八股文批評流派的傑出代表。

儲大文對從祖儲欣是頗為推崇的，並為之作傳，稱其為文「法」與「道」合，其實這也是他自己思想的表白。儲大文在寫給郁士超（峻升）的一封信中說：

古之人商推文藝，未嘗不合道與法而一之，如第聳牙其詞，作不類世俗語之句讀，而無與於道，至畔棄規矩而不自知，蓋古之人所斥也。……兄性故沉甚，絕無少年喜事之習，度異日無易此，而又時有所感慨，能自別於世之俯仰者，此近唐宋諸君子之道也。若又得其思所措注，自成一本末了然於心，以具風雨煙雲起變寂滅之勝，而又間規撫近世歸氏、魏氏之法，逡巡唐宋諸君子之堂奧。而一旦坐臥之，然則其書之於冊，合於尺度，而為有道者之言，以傳世行後，無疑也。風雅道喪久矣，幸得其人幾於古之道與法者！<sup>60</sup>

他認為，文章寫作當著力於「道」與「法」的相粘相合，而不是表現在字句的「聳牙戟口」上。所謂「道」是來自現實的生活感慨，「能自別於世之俯仰者」，所謂「法」是唐宋以來古文大家的文法。這一段話主要是針對古文而言的，不過，在他看來古文與時文是相通的：「經義參古文辭而神，業歧而二，以古文為時文，曷若為真正時文，此守溪、荊川所以冠冕一代也。」<sup>61</sup>以古文的文法寫作出來的時文，才是真正的時文，所以，對於從事時文的寫作者來說：「刻意繕性，辭理合轍，此有道而文者所宜拳拳也。」<sup>62</sup>「刻意繕性」指的是個人「通經學古」的涵養，「養者，文之內，非若其它膚貌可以剽襲而得」；<sup>63</sup>「辭理合轍」講的是文辭與文理的統一，亦即上文所說的「道」與「法」合，其中「道」當指四書五經所言之「理」，「經義」就是要疏釋闡發四書五經之「理」。他說：「經義雅以疏明理奧為本，彝典經綸，業落第二義。若覈議豎論，自《春秋釋例發微》外，直無庸措意。」<sup>64</sup>但是，在他看來，無論是攻時文者還是習古文者，均當以通經學古為高，並能脫去諛聞之陋。「予年二十時，嘗蘊是志，蘄折古今

<sup>59</sup> 儲郁文：〈先仲兄畫山先生行狀略〉，頁374。

<sup>60</sup> 儲大文：〈復郁峻升〉，載《存硯樓二集》，卷十二，頁590。

<sup>61</sup> 儲郁文：〈先仲兄畫山先生行狀略〉，頁375。

<sup>62</sup> 儲大文：〈與方靈皋〉，載《存硯樓二集》，卷十二，頁592。

<sup>63</sup> 儲大文：〈答吳霖蒼觀陽冠山胡坦中〉，載《存硯樓文集》卷十六，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集部第1327冊，頁360。

<sup>64</sup> 儲大文：〈答曹諤庭〉，載《存硯樓文集》，卷十六，頁359。

文之衷，俾工古文詞詩賦、工經義者無相排訾」。<sup>65</sup>他自己治學，便是為了通經致用，做到有補於世。「自諸經註疏、子史百家、歷代名人文集暨稗官野乘，旁及佛書、道藏，咸所綜貫，而尤講求實學，蘄克有濟於世，上窮究天文歷象，下考索方輿，自中國洪河巨山、重關保障外，及邊海諸荒徼，指畫其險夷、遠近、廣狹、堵截、戰守之要，將綢繆未雨，為國家建千萬世不拔之安」。<sup>66</sup>因為這樣，有的學者談到自己讀其文後的感受是：「讀其文者，如行異域而就熟徑，如登絕嶺而驟康莊，斯真班定遠〔班超〕之指南、李藥師〔李靖〕之韜略也。蓋先生嘗憤西域負固，擾我邊圉，故潛究墨訂，囊括山河，作〈取道〉上下篇；又憤章句之徒、介冑之士，不審天下大計，作〈原勢〉以下諸篇；至記、序、碑銘、雜文，亦皆牢籠古今，動搖山嶽。」<sup>67</sup>亦即儲大文的古文和時文，都體現了強烈的經世色彩，也正因為這樣，他的文章，無論古文還是時文，在當時文壇都有廣泛的影響。

儲大文論文主張「以仁義之質，標古雅之神」，<sup>68</sup>反對近世文章舒縱無節制的作法。他說：

前云近文苦舒縱乏節制，此近世以來科舉文古文通病，豈惟公安、竟陵無與於此，即號為得歐、曾遺法者，亦既合於和鸞鳴鑣之節，少所放軼矣！而圭峰〔羅玘〕不能節制其機，荊川不能節制其幹，鹿門不能節制其踈縱，震川不能節制其儒緩之習，祛斯眾蔽，庶幾遵巖，而又不能節制其刻畫古人之迹。歐陽文忠與子固論介甫文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顧刻畫曾王，少能自振，蓋屈首受節制，而節制反踈者，此則遵巖之短也。……〔魏〕叔子文與朝宗侯氏並雄於今，而有制過之。叔子自敘云不名一家，其論文亦以為日蝕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而推本言之，終無以自外於嘉靖間諸作者之旨。故其文差可師法，治科舉文亦可時時採服，以為舒縱者之藥石。<sup>69</sup>

「無節制」，從正面言就是缺少涵養。「近日囂靡不振，所缺在養。養者，文之內，非若其他膚貌可以剽襲而得」。<sup>70</sup>他一方面反對無節制，要求重視「養」，以古文的文法補救其弊；另一方面又提倡「古雅」，主張要重視「神」，亦即「以仁義之質，標古雅之神」。何之謂「神」？他說：「夫比日擇言家亦嘗采《在》、《閑》、《文韻》態度，而變

<sup>65</sup> 儲大文：〈與萬松齡〉，載《存研樓文集》，卷十六，頁362。

<sup>66</sup> 儲郁文：〈先仲兄畫山先生行狀略〉，頁373-74。

<sup>67</sup> 瞿源洙：〈畫山先生文集序〉，載沈粹芬：《國朝文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乙集，卷十六，頁1651。

<sup>68</sup> 儲大文：〈紹濂周子時文序〉，載《存硯樓二集》，卷九，頁554。

<sup>69</sup> 儲大文：〈答萬鶴樓〉，載《存研樓文集》，卷十六，頁357-58。

<sup>70</sup> 儲大文：〈答吳霖蒼觀陽冠山胡坦中〉，頁360。

通杜、宋、艾、楊之定式矣，然而得其膚未得其神也。古語曰：人知神而神，莫知不神而所以神，是且了不異人意，適在不疾不徐、若近若遠、無畸過無畸不及之間。」<sup>71</sup>「養」是針對於主體而言的，是對創作主體提出的要求；「神」是相對於主體而言的，是指涵蓋在作品中的神理韻味。「所謂氣可養而致，而養者文之內，抑匪若其它膚貌胥可剽襲得，夫惟神以帥氣者之雅，克凝霄宇而轟斗極邪！」<sup>72</sup>在他看來，「氣」通過「養」而得之，「養」則通過「氣」而表現在文之內；但是，文章卻不能滿足於有「氣」，還得以有「神」為其追求目標，這個「神」便是統領「氣者之雅」的東西。劉大櫚說：「神者氣之主，氣者神之用，神只是氣之精處。」<sup>73</sup>這裏，儲大文把劉大櫚所說的「氣之精處」理解為「氣之雅者」，所以，他提出了時文創作當以「古雅」為宗的主張：「夫神不古雅，雖有仁義之質，弗顯也，然神必待質而標。譬之月，質其明也，神其光也；未有明不生而光克耀者也。譬之樹，質其幹也，神其華也；未有幹不立而華克滋者也。」<sup>74</sup>他為吳冠山時文作序時，亦極推其時文之「雅」與「厚」，「雅」就是「古雅」，「厚」實為「養」的外在表現，「雅」與「厚」便是他對時文的美學要求。<sup>75</sup>

重視「養氣」，推崇「古雅」，是從總體上來說的，至於時文的具體要求，他還就「機法」、「氣韻」、「虛實」等問題發表了意見。他為洪時懋制義撰寫序文時說：

夫舉古人語暨詩律以論制義，不如舉先正之論制義者為映徹而易曉也。予擇明人書制義後語尤肖時懋文者，曰「如葉脫木，如水赴壑」，此言機也。又曰「玩其提點散落之妙，非動乎天機、御以成法，安能以寸管作梨花槍也」，此言機法並敏，而要而歸于機也。曰「氣如流雲」，此畸<sup>76</sup>言氣也。又曰「氣恬而韻逸，嗅之如有媽香」，此言氣韻並勝，而要而歸於韻也。又曰「其徵實也，不輕下一活字；其傳神也，不輕下一呆字」，此言虛實互參，去留互用，而要而歸于題冗文節、題槁文靈也。凡此者，胥肖時懋文，而至其健峭瞻朗為外間人士所胥曉者，尚未暇悉數也。<sup>77</sup>

這幾大範疇是針對文章技法而言的，「機」講的是文章的「勢」，「法」是指作者對「勢」的靈活運用和變通；「氣」講的是文章的活力，「韻」是指這種活力的外在表現；「虛實」講的是題目和文章的關係，題實者文當虛，題虛者文應實，這樣才會使得文題相得益彰。

<sup>71</sup> 儲大文：〈答沈確士〉，載《存研樓文集》，卷十六，頁361。

<sup>72</sup> 同上注，頁362。

<sup>73</sup> 劉大櫚：《論文偶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4。

<sup>74</sup> 儲大文：〈楊符蒼制義序〉，載《存硯樓二集》，卷九，頁558。

<sup>75</sup> 儲大文：〈吳冠山時文序〉，載《存硯樓二集》，卷九，頁555。

<sup>76</sup> 「畸」字疑衍。

<sup>77</sup> 儲大文：〈洪時懋時文序〉，載《存硯樓二集》，卷九，頁551。

明代是八股文從形成走向極盛的關鍵時期，儲大文極為推重「明四家」，即以王鏊（守溪）、錢福（鶴灘）、唐順之（荊川）、瞿景淳（昆湖）為明代八股文的傑出代表。他說：

夫舉世競習八股，而知者實尠。自明初解大紳、李西涯，法度寔備，至守溪王公益昌之。前輩序藁辭曰：「晴空灑氣，助其神明；名山大川，領其深致；繭絲牛毛，析其精理；行雲流水，盪其天機。此千萬人胥覩記者也。」守溪而降，斷推鶴灘，馬君常曰：「熔鑄經傳，變化無迹。」荊川推為本朝第一，良然。夫荊川文師守溪，而推鶴灘為第一，此當微參之。荊川嘗曰：「吾文已過關，薛仲常尚在將過未過間。」茅鹿門謂：「唐多匠心而近於風雅，薛負奇才而聲出金石。」又嘗與仲常論文曰：「公于時藝可謂項羽鉅鹿之戰，惜乎兵律猶少，恐當讓荊川一步。」仲常為投筋而起，此語洞中要害，故仲常不得不投筋，而荊川所謂過關者亦差可窺見。瞿昆湖嗣響王唐，然小試久滯，洎公安靜悟有得，歲科試胥第一，而布政使司禮部試亦聯雋。嘗曰：「文實不同，而遇亦因之。」前輩序藁辭曰：「瞿之養淵然靜深，非關文字，故其堅剛之骨，清純之氣，時行於圓融粹美之中。」……此論八股尤精徹語，宜微參之。舉此四家，餘可例推。<sup>78</sup>

這裏提到王鏊的貢獻是使八股文「法度」更趨完備，在他以前，明代八股文大多是直敘題面，敷衍經義，從他開始八股文已注重技法：「守溪自然算時文第一手，本是一極體貼好講章，又創出許多法則。其安頓亦極好，極費經營，而絕不見有巧處。此所以好。若一見巧，便不好。制科本意，不過如此。到如今，耐推敲者惟守溪。」<sup>79</sup>正如當代學者所云，王鏊的文章開了後人無數法門，起伏、開合、呼應、虛實、正反之法無所不備，亦如鄭鄖所說「應有盡有，應無盡無，後有作者，弗可及已」。<sup>80</sup>錢福少負異才，學識淵博，能隨意驅使經典史傳，亦即馬世奇所說的「熔鑄經傳，變化無迹」，他對八股文的重要貢獻是化才情入法度：「鶴灘之文，發明義理，敷揚治道，正大醇確，典則深嚴，即至名物度數之繁，聲音笑貌之末，皆考據精詳，摹畫刻肖，中才所不屑經意者，無不以全力赴之。」<sup>81</sup>接續錢福的有唐順之和薛應旂。唐順之恪守道統，以古文為時文，援唐宋古文之法入於八股文，俞長城稱其「文似東坡，法律本守溪」；薛應旂受王學影響較深，為文出奇制勝，並不遵依朱注，這就是

<sup>78</sup> 儲大文：〈答吳霖蒼觀陽冠山胡坦中〉，頁360。

<sup>79</sup> 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十九，頁879。

<sup>80</sup> 鄭鄖：〈明文稿彙選序〉，載《峯陽草堂文集》卷七，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26冊，頁372。

<sup>81</sup> 俞長城：〈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載《錢鶴灘稿》，清康熙刻本，卷首〈題識〉。

茅坤所說的「薛負奇才而聲出金石」；但從法律嚴整的角度看，薛應旂不及唐順之，唐順之說「薛仲常尚在將過未過間」，應該指此。瞿景淳雖為王鏊、唐順之的嗣響，但又吸引了公安派「靜悟」之法，因而形成了一種「調息凝神，涵養性靈」的思想。瞿氏說：「吾自靜養百日以後，始覺夜氣清明，良心漸復，然愈不敢不加意收斂。……故執筆為文，能言乎人所不及言，發人所未及發。我之勝於人者以此，人之不及我者亦以此。」<sup>82</sup>在儲大文看來，沿著「四家」而下，則有以「豫章四俊」為代表的「西江派」：「經義正宗，首尊守溪、鶴灘。荊川得之鶴灘，昆湖獨得之守溪，而西江鄧文潔公又得之昆湖，胥以清深靜悟為宗，以遞傳至泗山鄒氏、文止羅氏。今觀東鄉艾氏《定》、《待》評推語，暨大士陳氏《文止經義序》，所謂『以仁義之質，標古雅之神』，品尤尊而可貴者。蓋以其為瞿、鄧正宗而彌尊之也。」<sup>83</sup>他標舉晚明西江派，是要吸取西江派之長，並與吳中地區諸文派相會通：「當西江以豫章社鳴，時吳郡復社西銘、受先二張氏、復庵楊氏、吉士錢氏，文胥敦雅，故婁東之派，獨為豫章、雲間、金沙、萊陽五派正宗。」<sup>84</sup>繁盛的晚明文壇，為婁東、豫章、雲間、金沙、萊陽諸派所籠罩。他以為惟「婁江」得其正宗，它接續王鏊、錢福而來，並融有豫章、雲間、金沙、萊陽諸派之長。

### 儲掌文：「原本儒書，恪宗先正」

傳儲欣衣鉢者尚有儲掌文。掌文(1687-1770)，字曰虞，又字越漁，號雲溪，儲芝長子，儲欣之孫，由邑廩生中試康熙丁酉(1717)舉人，乾隆丙寅(1746)選授四川納溪縣知縣。「公甫離髫鬢，已能握管咿唔，出語驚其長老。在陸公喜，益授以《左》、《國》、《史》、《漢》、八家文，業乃大進」。<sup>85</sup>乾隆初，宜興有荊南社，其中，「荊南三子」名冠一時，掌文以少年馳逐其間，聲望實不相上下。「為制藝出入經史，震盪炳耀，才氣無雙，歸於典則；古文義法，具有淵源，雄邁如孟堅，質健類子固；晚近以來，莫有倫比」。<sup>86</sup>他自納溪知縣卸任後，掌教瀘洲錦江書院，越三年，返鄉授徒，先後坐館白沙洪氏、廣陵程氏。「蓋一生為人士師日居多，亦如在陸先生之文章，衣被海內，傳授無窮，臯比談經，誨人不倦，其風流殆未艾矣！」<sup>87</sup>

儲掌文亦以八股文鳴於時，自謂：「少承祖父訓，出則與諸文士相劇切，頗用力於時文，至古文，則門仞未窺，何論堂奧？雖自《左》、《國》以下，洎中唐北宋諸大

<sup>82</sup> 郁熙灝：《時文小題約鈔》，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卷首，〈論文〉。

<sup>83</sup> 儲大文：〈純仁任子時文序〉，載《存硯樓二集》，卷九，頁559。

<sup>84</sup> 同上注。

<sup>85</sup> 儲麟趾：〈雲溪公傳〉，載《雲溪文集》附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67冊，頁659。

<sup>86</sup> 吳華孫：〈儲雲溪先生傳〉，載《雲溪文集》，附錄，頁658。

<sup>87</sup> 同上注，頁659。

家多所誦肄，祇取以供時文作料，要無敢縱筆效顰。」<sup>88</sup>正如其祖在陸先生一樣，他是以前古文為時文寫作之料的，據說儲欣的《唐宋八大家類選》，就是專為教授他而編選的，<sup>89</sup>他的時文亦鮮明地體現了古文的文法：「先生少工制舉，兼治古文，第因令甲所在，專以房行試牘為教授，而不遽及古文。然亦時取《左》、《國》、《史》、《漢》、唐宋大家之文相浸灌，則又未嘗不以古文餉遺也，故遊其門者，每於時文中得古文之趣。」<sup>90</sup>他不僅以古文文法融入時文，還以古文義理闡釋時文，並以韓愈文「無難易，惟其是爾」的理論解說時文。他說：「凡論為文之道，莫脩於昌黎氏之書，其要旨則曰：『無難易，惟其是耳。』」<sup>91</sup>何謂「惟其是」？他在評任暢亭時文時說：「今獲觀全稿，難并美具，未易悉數。大約理實則融貫儒書，議論則錯綜經史，波瀾意度則出入於《左》、《國》、《史》、《漢》、中晚唐北宋諸家，而按之時文矩矱，復不失尺寸，余不敢攀援古昔，謂其於前明諸鉅公，宗仰者何派，酷肖者何人，第曰：『文如是！』」<sup>92</sup>所說時文的「惟其是」，即不逐時趨，不以他人之是非為是非，亦即以儒書為其理，以經史為其論，以秦漢唐宋諸家為其法，也就是他在評價王鏡溪時文時所說的「理精法密，詞鍊氣昌」。他說：「今觀公〔指王鏡時〕文，不為苟難，亦未嘗出之太易，而取心注手，若或相之，當丙午、丁未後，間亦追逐時好，規倣墨裁，要以理精法密，詞鍊氣昌，無一不歸於至是而後已。」<sup>93</sup>至於「理精」、「法密」、「詞鍊」、「氣昌」的具體內涵，他在評價王鏊時文時有一個形象生動的解釋：「逮吾吳王文恪公出，然後布帛菽粟者其理，周規折矩者其法，日星河嶽者其氣，精金良玉者其辭，譬若詩家之少陵，擬諸周公制作，嗚呼，盛矣！」<sup>94</sup>在他看來，「惟其是」其實就是「求其真」，闡明經傳之「微言」，發為事理之「極致」。他為張景雲時文作序時說：「余觀先生文春容寬博，乍讀之，似無非常可喜者，再三讀之，乃知其原本儒書，為真理實；恪宗先正，為真法脉；出入韓、歐，折衷古六藝，為真氣魄，真才情。子韓子論文曰：『無難易，惟其是耳！』余亦曰：『無平奇濃淡，惟其真耳！』」<sup>95</sup>「原本儒書」就是以四書五經為其理，「恪宗先正」就是以明代制義大家為師法對象，

<sup>88</sup> 儲掌文：〈雲溪文集自敘〉，載《雲溪文集》，卷首，頁485。

<sup>89</sup> 吳振乾云：「先生晚年課孫，自《左》、《國》、《史》、《漢》，下逮唐宋諸家，各有約選定本，而《八家類選》一書尤便揣摩。」見吳振乾：〈西漢文選例言〉，載儲欣（編）：《古文選七種》，乾隆五十年（1785）二南堂刻本。

<sup>90</sup> 程徵榮：〈凡例〉，載《雲溪文集》，卷首，頁486。

<sup>91</sup> 儲掌文：〈王鏡溪時文稿序〉，載《雲溪文集》，卷三，頁574。

<sup>92</sup> 儲掌文：〈任暢亭自訂稿敘〉，載《雲溪文集》，卷三，頁582。

<sup>93</sup> 儲掌文：〈王鏡溪時文稿序〉，頁574。

<sup>94</sup> 同上注。

<sup>95</sup> 儲掌文：〈張景雲時文序〉，載《雲溪文集》，卷三，頁579。

「出入韓、歐，折衷古六藝」就是要吸收古文文法並把它靈活地運用到時文的寫作上，如果達到上述三點要求，所作自然就會進入「惟其所是」的境界。

他不滿當時文場因追逐時風，而墮入「貪常嗜瑣」、「驚險趨奇」之途，指出：「近操觚家，指趣分馳，弊病百出。貪常嗜瑣，則多塵飯土羹之談；驚險趨奇，則涉牛鬼蛇神之貌。質諸大雅，均無取焉。」<sup>96</sup>在他看來，當時科舉文場，有的偏於瑣碎，有的偏於奇險，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與主考官的好惡大有關係，其好惡往往能起到轉移文場風氣的效果。

余惟時文一道，前朝用以取士，而昭代因之。闡明經傳之微言，發摛事理之極致，視詩賦論策，固當遠勝。而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往往轉移風氣於一日之間，而亦為風氣所轉移於三年或十年之後，遞相倣倣，亦互相譙訶。所尚或在空靈也者，沿而甚焉，幾於束書不觀；一變而沉實，則又失之彭亨菌蠢矣。所尚或在刻琢也者，沿而甚焉，幾於乘車入穴；一變而鮮濃，則又失之偽采淫聲矣。當其未變，奉若蒼龜；及其既變，棄猶芻狗；楚固失之，齊亦未得。大都追逐時好，而真宰不存，其無當於古作者立言之旨，則一也。<sup>97</sup>

在他看來，無論是空靈抑或沉實，是刻琢抑或鮮沉，都有其弊，其故何在？這就是「追逐時好」，「真宰不存」，也就是背離了「古作者立言之旨」，亦有悖「闡明經傳之微言，發摛事理之極致」的要義。因此，他對於那些不逐時風，以「惟其是」而是求的科場寒士，在多處表達了其敬佩之心和表彰之意。如張景雲當其屢舉不第，有人勸他以貶技求合於時趨，他卻掉臂獨行，始終自守而不失故吾，「用克延草堂〔指儲欣〕一綫之傳，以追隨於震川、思泉、荊川、萊峰諸老先生之列，其足以信今而傳後無疑也」。<sup>98</sup>又儲龍光為文，或含毫欲腐，或振筆疾書，一以豐骨神味為主，沉思獨往，擺脫凡近，抉精剔華。「期到古人昌黎氏所稱克自樹立不因循者，君是也」。<sup>99</sup>還有荊南四子，「張丈〔張朱銓〕之文，天才艷發，脫口如生；容川〔吳端升〕之文，沉思獨往，刻露清秀；兩周先生〔道存、紹濂〕則並原本六經，銜華佩實，而紹翁〔道存〕以密麗勝，道翁〔紹濂〕以新琢勝，其天賦又有不同者。此四者，皆斷然為一家之文也」。<sup>100</sup>因此，在他看來，時文水平的高下並非取決於科名，而取決於它是否「自樹一家」，「惟其是而已」，亦即能否做到「闡義理」、「窮物態」。「夫自前明以來，

<sup>96</sup> 儲掌文：〈王鏡溪時文稿序〉，頁574。

<sup>97</sup> 儲掌文：〈張景雲時文序〉，頁579。

<sup>98</sup> 同上注。

<sup>99</sup> 儲掌文：〈正蓄堂稿序〉，載《雲溪文集》，卷三，頁588。

<sup>100</sup> 儲掌文：〈周道存時文敘〉，載《雲溪文集》，卷三，頁577。

尤榮進士科。至文章高下，初不係是。文之高者，必能闡義理之精微，窮事物之變態。取材於經，取氣於古，取法於先輩大家，而又自具錘鑪，不躡故迹，乃足以名當時，傳後世。<sup>101</sup> 在他看來，如果能在取材、取氣、取法等方面，既能得力於「先輩大家」，並能自成一家，形成自己的風格，則自足以流傳後世，成為流傳千古的名篇佳作。「夫文章千古，得失寸心，外來得失，殊非寸心所克定。唐之羅隱、方干，宋之蘇洵、李廌，前明之元長、房仲、思曠、吉士諸先生，其艱於一第猶是也。許子但自問其文有可以信今而傳後，斯足矣！而何怨乎天，何尤乎人哉！抑聞之，伏波將軍之言曰：『窮且益堅，老當益壯。』以余所見，大器晚成，往往而是」。<sup>102</sup>

儲掌文對八股文理論的探討，還從一般性的章法討論，上升為對其規律性問題的總結和歸納。他認為，一個人文章成就的高下，還與他的家學淵源、師友砥礪以及地域傳統密切相關。所謂「家學淵源」，就是一個家族長期以來形成重文尚學的傳統，這一傳統在江南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如，吳中王氏素以文章擅天下，先有王鏊，後有王世琛（康熙壬辰科狀元）：「今川南觀察使鏡溪公，文恪之九世孫，而殿元之仲子也。胚胎前光，早露頭角，成童握管，即激賞於吳寶巖、秦龍光諸先生，弱冠游齊魯，遊燕京，所交皆當代名流，浸灌摩揉，益閎以肆。……及發其藏稿讀之，鏗鏘輝煥，有非憔悴專一之士所能與較其毫釐分劑者，夫乃嘆家學淵源，真傳一綫，不可誣也。」<sup>103</sup> 在談張景雲時文時也談到，他的父親慶之翁和他的季父宣之翁，都曾師事儲欣，隸籍草堂，工文善書，稱高弟子。「先生稟承家學，自少迄壯，不名他師，蓋一綫淵源，所從來者遠矣！」<sup>104</sup> 又談到任暢亭時文時指出，任氏家族有悠久的家學傳統，從任元祥到任啟運再到任暢亭一脈相承：「任氏故多材，曩者王谷〔任元祥〕先生，工制義，兼工詩古文辭，入郡國儀社，爭推祭酒。余所及見則鈞臺〔任啟運〕先生最焯著，湛深經學，制義亦絕工。……吾友暢亭。暢亭少食貧，刻苦力學，出其文於筆硯之伍，讀之，或舌橋不能下，獨先君子雅相激賞，目為樂安氏第一人。」<sup>105</sup> 還有，師友的砥礪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明末清初有儲欣主持宜興文壇，而後又有儲大文成為康熙文壇領袖，到儲掌文生活的雍正時期，宜興地區則有麗社和荊南社等文社，這兩個文社的活動時間大約在康熙末雍正初。他回憶說：「余年十五六，奉先君子命，出與邑中諸英俊游，相切劘以文字。初訂八人，後廣為十四人，命曰麗社。每月一課，循而行之，凡七八年。……方麗社之集也，長者甫逾弱冠，少者裁十餘齡，時俱應童子試。不數年，相繼游庠，里中頗以為絕盛。」<sup>106</sup>

<sup>101</sup> 儲掌文：〈藥坡弟時文稿敘〉，載《雲溪文集》，卷三，頁589。

<sup>102</sup> 儲掌文：〈許湯陳時文敘〉，《雲溪文集》，卷五，頁657。

<sup>103</sup> 儲掌文：〈王鏡溪時文稿序〉，頁574。

<sup>104</sup> 儲掌文：〈張景雲時文序〉，頁578。

<sup>105</sup> 儲掌文：〈任暢亭自訂稿敘〉，頁581-82。

<sup>106</sup> 儲掌文：〈張景雲時文序〉，頁578。

又云：「憶余年十六七，出與邑中諸文士訂麗社，共十有餘人。最長者為雙南徐兄，張兄景雲次之，葦齋最少。……當課文日，向晨畢集，務罄一日之長。比脫稿，則互相激賞，亦不廢箴貶。既乃劇飲淋漓，談諧雜作。葦齋恒與徐、吳數子即席賦詩，醉後更蹋臂連吟，步月蛟橋南北，興盡然後返。一時友朋萃處之樂，豈不盛哉！」<sup>107</sup>又憶荊南社云：「往者，當康熙丁亥〔1707〕、戊子〔1708〕間，吾邑舉荊南社，彙耆英十數人，講學論文，與吳門、金沙相應和。時先君子〔儲芝〕齒加長矣，率余小子追陪其間，而意中所推服則張丈閩賓、吳外兄容川，道存、紹濂兩周先生為之甲。……社之課，月一舉，先期一日，次第集司會者家，尊酒談諧，極歡乃罷。黎明，各就研席，窮日之力，或焚膏繼之，抽秘聘妍，千彙萬狀，而四君子者實為之甲。」<sup>108</sup>大約在這同時，儲掌文還在喬氏存園結社：「在壬癸〔1712-1713〕間，我方假館喬氏，介喬子渭璜以請，爰定師友交。當是時，諸名流翕集，如王子熙聞、汪子曲江輩十餘人，皆晨夕過從，相切劘以文字，蘄力古人而從之。既而大會於二里橋之存園，園主人蛟臺吳先生邀余主盟，競秀爭奇，目不給賞，是秋多入彀者。」<sup>109</sup>他們通過結社，既有文酒之會，更有砥礪之效，因此，在江南地區文人結社，便成為一種常態，成為一種風尚，成為一種傳統。不僅如此，一地之人文傳統還會影響到其文風的發展走向，他非常自豪地談到自己家鄉宜興所在的蘇南地區優越的地理環境和人文風尚：「吳越人文甲天下，越之有杭嘉湖，猶吳之有蘇、松、常、鎮也，而常湖兩郡，介震澤而居，風氣雅相類，自前明迄今日，大家名家，先後相望，即五尺童子，操觚挾冊，皆斐然有意於古文，非獨地靈使然，蓋師友淵源所漸摩者深矣！」<sup>110</sup>當然，他更在多處提到自己的家鄉宜興地區的人文傳統，他說：「吾邑山水甲常郡，秀靈之氣，磅礴鬱積，能文士往往出於其間。」<sup>111</sup>哪怕是未能取得功名的寒素之士，在古文和時文上也毫不遜色，所謂「今海內人文之盛，首推江左，輒齒及吾邑。在吾邑，亦復齒及寒宗」。<sup>112</sup>比如自己的儲氏家族，自唐開元御史公儲光義，肇開文學，歷宋元明，一線綿延，至本朝而益著。「吾宗能文之士代有，在前明則明經忝鞠公、翼子公、九游公，國初則文學耀遠公、君宜公、研田公、允文公，康熙中則明經遠聞公、宛若公、虞庠少白公、孟為公、志讓公暨先君子，皆號江左宿儒」。<sup>113</sup>此外，還有延陵吳氏，「匪直科名接武，其窮而在下，號文壇飛將者，往往有人。余

<sup>107</sup> 儲掌文：〈史葦齋時文稿序〉，載《雲溪文集》，卷三，頁580。

<sup>108</sup> 儲掌文：〈周道存時文敘〉，頁577。

<sup>109</sup> 儲掌文：〈許湯陳時文敘〉，頁656。

<sup>110</sup> 儲掌文：〈陳宅三時文敘〉，載《雲溪文集》，卷三，頁576。

<sup>111</sup> 儲掌文：〈湯弘敷時文序〉，載《雲溪文集》，卷三，頁583。

<sup>112</sup> 儲掌文：〈藥坡弟時文稿敘〉，頁589。

<sup>113</sup> 同上注。

耳目所及聞見，與先大父同應歲科試，遞為甲乙；時則有若寶成先生綸，與先君子同研席，互相推致，恪守草堂一綫之傳；時則有若紹文先生嗣肅、又葵先生厶、子昭先生麟徵，與余年相亞，稱文字莫逆交；時則有若書聯君紘初、思石君元豹、景文君俊華；後起則起劉君健、於上君庸建，亦為一時之秀」。<sup>114</sup>從這幾個方面看，儲掌文對於八股文的認識，實際上是從更宏觀的角度亦即家庭、師友、地域等，深入到對八股文創作現象作規律性分析和探討，這是對傳統八股文批評的理論升華。

## 結語

通過上述分析討論，我們大約知道，清初宜興文派發展的實際情況及其主要的時文觀：

一、這是一個儲氏家族成員為核心，包括宜興地區其他文人在內組成的，一個以古文為時文的文章流派，他們在時文寫作上是「鑄唐宋以探秦漢之精，采天崇以化正嘉之貌」；

二、他們認為古文與時文應該相濟為用，古文與時文各有其美。時文是鮮肉，有時效性；古文則是穀種，有恆久性；對古文的學習能起到提高時文寫作水準的積極效果；

三、他們認為文章的寫作不能追逐時風，隨人隨時俯仰，而應該是「惟其是而已」，亦即「求古者立言之意」，「闡明經傳之微言，發摛事理之極致」；

四、他們對於寒素之士的「求其是」給予了表彰，批評了追逐時風的圓熟、平滑、貪常嗜瑣、驚奇逐險之作；

五、他們認為文章成就的高低與科場窮達沒有必然關係，文章自是文章，科舉自是科舉，不能以科場的順達作為文章評判的標準，而應以是否「理精法密，詞鍊氣昌」為標準；

六、他們還認為一個人文章成就的高下，與他的家學淵源、師友砥礪以及地域傳統密切相關。

對於這樣一個在明末清初文派紛起背景下出現的文派，應該做怎樣的歷史定位和價值認定？其實，對當時文壇風氣的批評，對明代八股名家的認定，以及以古文為時文的提法，在明末清初是通行的批評話語，唐宋派、豫章派、桐城派對此都有討論，但宜興儲氏的一些核心觀點卻是其他各家各派所未能深入論述的，比如它始終是立足在古文的立場對時文提出要求，這有固根立本的意義，因此，不同於豫章派、桐城派熱衷於編選八股文選，它把主要精力放在遴選秦漢以來優秀的古文上，先後編有《古文選七種》、《唐宋八大家文選類鈔》、《唐宋十大家全集》等，卻惟獨不

<sup>114</sup> 儲掌文：〈吳懷青遺文敘〉，載《雲溪文集》，卷三，頁582-83。

見由其編選的純粹的時文選本。因為著眼在固根立本，所以，這一文派主張「求古者立言之意」，不以一時科途順達為追求目標，因而使得他們的眼光更為宏闊，能從「文章」而不是「科考」的角度看問題，「養氣」、「求真」、「古雅」、「理法」這些涉及到「文章」的問題便成為他們熱議的話題和討論的核心。

自隋唐推行科舉制度以來，科舉對於文學對於文章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到明清這一現象已成為中國文化史的特有景觀，在明代有唐宋派、豫章派、雲間派，到清初則有桐城派和宜興派，這些文派在古文與時文兩個領域均有所成就，但長期以來，我們只看到這些文派在古文上的貢獻，而往往忽略了他們在時文上的突出表現，從文章發展史立場看實有失公允。

# Criticism of *Baguwen* Writing in the Early Qing: Focusing on the Chu Family of Fengyi

(Abstract)

Chen Shuiyun

The Chu family of Fengyi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Yixing School of writers in the early Qing. They had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both ancient prose writing and modern prose writing, with Chu Xin, Chu Dawen, and Chu Zhangwen as representatives. Proposing to treat ancient prose as modern prose, they also looked to four aspects: *yuanben Rushu* (write in line with Confucian Classics), *kezhong xianzheng* (scrupulously follow the precedents of former sages), *churu Han Ou* (assimilate the writings of Han Yu and Ouyang Xiu), and *zhezong gujin* (mediate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In order to combine *dao* (Confucian Way) and *fa* (method), they believed that what they advocated would help make modern prose meet the true purpose for which the ancient writers had written. They made specific requirements concerning *baguwen* (eight-legged essay) writing. They pursued a graceful, classical style that embodied the concerns for empathy, correctness, and justice in its graceful, classical expression *yi renyi zhi zhi, biao guya zhi shen*, as well as emphasizing cultivating *qi* (generative energy). Moreover, they further set the Four Masters of the Ming as models and discussed how some writers had developed their own writing styles. All of this brought the criticism of *baguwen* writing in the early Qing to a new level.

**關鍵詞：**宜興文派 儲氏家族 八股文批評 以古文為時文

**Keywords:** Yixing School of writers Chu Family criticism of eight-legged essay writing treat ancient prose as modern prose